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1 2002
(总第1期)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

人民公社失败的制度经济学解理
——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经济绩效"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人民公社组织制度低效率的根源,并引入"柠檬市场"模型从监督成本的维度解析了败德行为造成人民公社失败的生成机理。

关键词:人民公社;组织制度;监督成本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一、组织制度与效率:一个分析框架

一个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既取决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组织制度安排与环境的相容性。这里的环境不仅指制度环境,而且还包括经济组织运行的资源环境、产业特性及其市场环境。不同的组织形式,当其产权结构(制度安排)不同时,其隐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不同,从而影响作为经济人的参与者的行为努力(生产性努力或分配性努力),进而导致经济组织的不同绩效。

"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我们将其引入经济组织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并构建立一个"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经济绩效"分析模型:[②]

$$Q=F_R[C(T,k_1,S_1,S_2,A,I)\mid L,K_2,M]$$

其中:$R=f[r,m,e(e_1,e_2)]$

式中:Q代表一个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是劳动(可细分为劳动数量L_1、劳动质量L_2)、物质资本(K_2)及原材料(M)投入的一个函数。

C代表了经济组织可采用的组织形式的选择集,[③]它由组织内部的有关技术(T)、知识禀赋(k_1)、组织规模(S_1)、市场规模(S_2)、资产特性(A)、产业特性(I)等因素(这些可统称为经济组织的

作者简介:罗必良,男(汉族),博士,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0BJY072),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2000076),博士学科点科研基金(20000564 1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990894),"千百十工程"优秀人才培养基金(200062)项目.

① J. Tirol,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ssa—chus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8, P1—3.

② 詹森和麦克林曾建立过类似的模型. 见M.C.Jensen and W.H.Meckling, Rights 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 Application to Labor—Managed Firms and Co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1979, 52(No.4):469—506. 我们的模型可以看作是对詹森和麦克林模型的拓展。

③ 詹森和麦克林认为,C表述了组织形式选择集的一个综合标志,它包括的参数如"合伙制还是股份公司形式、管理分散化的程度,是自己购买还是租赁设备、报酬计划的特征"等等。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技术交易结构)所决定。

F 是所有生产函数的总称, 它能按照制度结构分割。F_R 是对应于制度结构 R 的一个生产函数。制度结构R 由产权结构(r)、内含的计量能力或考核能力(m)、制度环境(e, 其中e_1 为正式制度环境, e_2 为非正式制度环境)所共同构成。

显然, 制度结构 R 决定着组织形式选择集C(决定何种组织形式被允许或被反对), 一个约束较多的 R 会决定一个较小选择空间的 C。C 必须与 R 相容, 否则会导致某种组织形式极高的运作代价。进一步地, 组织形式 C 的选择会影响到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行为, 从而决定着经济组织的绩效高低(生产可能性边界)。

我们以埃塞俄比亚农民的案例, ④对上述模型做进一步说明。

1975 年的埃塞俄比亚革命和随后组建的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农业的制度结构 R。以往大部分由封建领主拥有的农田被政府收归后一小块一小块地分配给农民使用, 由此政府实际上充当了地主的角色。

新的制度结构 R 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不准许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签订长期租赁合同, 使用的土地数量不能超出政府规定的界限, 农民被迫以政府定死的低价出售产品, 不允许他们按市场出清价格签订购销合同, 此外政府还反对农民存储剩余谷物, 不准雇工。

在这样的 R 条件下, 使得埃国农民合法选择组织形式的空间 C 变得相当有限。比如说, 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就被排除在外, 农民也不可能采用和发展与这种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技术和生产函数。

制度约束与组织形式的有限选择, 大大打击了农民对其耕地进行长期改良投资的积极性。对私有产权的限制, 尤其是当个体农民的排他性所有权受到限制又不准他们签订长期租赁合同时, 农民不可能将其资源配置到各种有潜在利益的投资项目上, 因为他们对未来收益的享益权不确定。

由此, 埃国新的制度结构改变了农民配置资源的决策及行为, 农民普遍降低工作努力程度, 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农业的生产率, 农业的经济绩效大大降低。以致 1985 年在遇上干旱和内战时, 该国几百万人死于饥荒。

案例证实了模型的含义, 即: 制度结构 R 决定组织形式 C 的选择, 进而决定着行为, 并由此影响着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

我们的模型表明, 在影响组织经济绩效的因素中, 有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经济组织内含的产权结构。法律对产权的初始界定及其对伴随交易过程发生的权利让渡的再界定所形成的产权结构, 即构成产权的权利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主体能否存在充分的激励去付出努力以寻找更有效的组织方式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 权利界定的清晰程度也是影响组织内部成本的重要变量。正如科斯[1]所说, 对个人权利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是无权力的制度。产权对经济组织及其行为主体具有显著的行为发生学意义。

二是经济组织对集团成员的"努力"的考核能力和"报酬"的计量能力。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差, 即一个人的努力程度与其努力结果(报酬)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 那么该经济组织的效率将很低——因为存在"偷懒"与"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反之, 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强, 其组织效率也高[2]。良好的计量能力能够有效地激励人的生产性努力, 约束分配性努力[3]。一个经济组织计量能力的高低, 取决于所内含的激励约束机制, 尤其是监督机制及其实施成本。

④ 参见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114—115 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三是经济组织所依存的环境特性。经济组织的环境至少包括制度环境、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三个方面的内容。制度环境(如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宏观政策等)对于嵌于其中的经济组织的效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宪法秩序尤为重要,它为产权安排及组织构造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组织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方式。同样,政治体制决定着一个特定的产权博弈,从而也决定了一个特定的博弈均衡,并经由博弈均衡决定了政府行为和产权制度[4]。

此外,进入经济组织的资源及其产出品的特性以及产品的市场结构,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我们对人民公社失败根源的考察,将在上述"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并着眼于组织效率的评价来进行。

二、人民公社失败的根源:组织制度低效率

(一)人民公社的组织制度特征

从1958年建立并于1962年完全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框架上的人民公社,在产权组织和运行上,表现出下列特征:⑤

1、单一的公有形式。在主要生产资料归属方面排斥所有制的私人性质。

2、各级管理者由行政任命,而非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管理权力集中,但经营责任不明确,管理者常常无视经济效益,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业务。

3、经营一般是自给性的,很少发生市场交易,仅有的商品部分按照给定的计划价格由政府统购统销。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严禁长途贩运。

4、集中与统一安排劳动力,限制农业劳动力流动。

5、分配上忽视农业生产特点和劳动者智能与体能差异,以工分制度体现平均原则。

(二)低效率的表现

1950—1952年,我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43.2%和17.8%;而1957—1978年则分别降为2.1%、1.3%和1.0%,并且此间波动甚大。不仅如此,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均占有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并无明显增长;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给社会的农产品量却明显下降(见表1)。

人民公社制度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整个农业发展迟滞,而且造成农民收入的增长极为微弱。从1957年到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仅增加64.22元,平均每年仅增3元,而且增收部分大多来自集体,家庭副业因为"左"的思潮影响而增长甚微。

(三)根源分析

人民公社的制度形式,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判断,显然更多地具有共有产权或社团产权(communal property rights)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的集体产权(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尽管我们习惯上称其为"集体所有制"。二者的区别在于:共有产权的参与者对一种资源行使某种权利时,无需事先与他人协商,但也不排除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说,这种产权是共享的,在个人之间完全不可分,它不可以同时也没有对象化到其各个成员身上;集体产权的参与者在行使他对资源的各种权利时必须事先由该集体按照一定的程序或规则做出决定,但这种对资源的权利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分解或对象化到其成员的身上,如果该参与者对集体关于资源权利行使制订出的规则和约束(以及实施)不满,他可以以有偿转让权利的方式退出该集体。

---

⑤ 参见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课题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与发展政策研究》,《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5年第6期。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表 1　1957— 1978 年的农业生产与农民收入

年份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人均占有农产品量(公斤)	人均占有粮食	306.0	240.5	272.0	293.0	310.5	318.5
	人均占有棉花	2.6	1.15	4.95	2.8	2.6	2.25
	人均占有油料	6.1	3.6	5.05	4.6	4.95	5.45
	人均占有肉产品	6.25	2.9	7.7	7.3	8.7	8.95
	人均占有水产品	4.9	3.4	4.25	3.9	4.8	4.85
农业人口平均提供产品(公斤、头)	糖食 a	85.05	57.85	64.9	66.1	67.35	62.6
	棉花	2.65	1.15	3.25	2.9	2.85	2.6
	食用油	1.95	0.65	1.4	1.45	1.0	1.1
	肥猪 b	0.075	0.034	0.130	0.108	0.132	0.135
	水产品	3.2	2.65	3.05	2.85	3.25	3.3
农民人均收入及来源(元)	农民人均收入	87.57	111.53	117.27	129.25	133.45	151.79
	其　从集体得到的	43.40	52.52	63.17	78.35	76.05	88.53
	中　家庭副业生产	36.08	50.59	43.36	42.43	49.17	54.01

注: a 粮食包括征购和议购粮; b 肥猪包括活猪和折成头数的猪肉。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 40 年》,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P130— 133.

在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中著名的"三级所有"及其可过渡性, 实际上是一个使产权模糊化的安排形式, 它几乎否定了任何确定性的产权主体。土地所有权虽名义上属社区集体所有, 但土地的使用权却是由政府决定的(种什么、种多少完全听命于"上级"); 当时的国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租赁, 土地的转让被视为非法; 政府还通过统购统销以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形式将农业土地的地租收入隐蔽地转移到国家手中, 并以户籍制度的形式将农民近乎是强制性地约束在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村社会。因此, 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集体的农民对土地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 而一切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农村劳动力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指挥、统一调配和统一使用, 也否定了作为农民个人对私产乃至自身劳动力的产权。

这样的产权界定状态, 自然无法创造出有效的竞争机制与竞争秩序, 产权制度对经济体制的激励、配置、保险和约束功能无从体现。农民没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土地的利用必然是低效的甚至是完全浪费的; 由于农村任何资源产权都失去了具体明确的责任主体、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 其产权安排几乎不具有排他性, 因而行为主体的分配性努力大大超过了生产性努力; 在偷盗、"磨洋工"、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盛行的情形下, 由集体(公社或生产队)来对每个农业劳动者进行监督不仅十分困难, 且费用极高; 正因为每个成员的努力程度的监督与评价费用高昂, 在公社化制度下就无法实现"按劳取酬",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成为这一产权安排运行的必然结果; 平均分配使每个成员的报酬与其努力的关联极低, 势必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与劳动效率低下, 由此农业增长陷入停滞。

生产队在"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中, 被看作是基本核算单位, 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农业生产企业: 生产队拥有其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和劳动力(指对劳动力的使用具有支配的权利, 这一权利一般情况下公社和生产大队是不具备的), 并拥有相应的牲畜和农具及小型农机具; 拥有因地、因时种植和进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

然而, 同农民拥有的产权一样, 生产队的产权也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产权。1962 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 ①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一律不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准出租和买卖,从而限止了其资产的可转让权;②生产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条件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大大弱化了生产队对资源的使用权;③收益分配之前必须完成征、派购任务(实际包括农业税和政府的低价收购两部分),超过口粮的剩余部分实行国家超购一部分、集体储备一部分,最后的剩余才分配给个人(三个部分各自的比例由政府确定);这一规定大大削弱了生产队应该拥有的收益分配权;④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一般情况下社区成员没有自由迁移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这是对人力资源所有权的限制;⑤否定资产具有剩余分配的权利。

在上述的产权结构基础上,我们无法认定人民公社的组织制度安排如何能够有效率。事实上,生产队除了受到上述强制性的产权约束之外,还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限制:其一,公社一级组织具有行政权利,它可以以命令的方式对下级的生产活动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又可以直接指导和管理大队与生产队生产、分配及交换活动,并监督完成计划(尤其是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征、派购任务),这表明生产队的任何自主选择都会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制约。其二,大队队长或支部书记具有双重代理人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公社职能的延伸,代理公社协调和管理生产活动,同时他们又是社区成员的代理人,不仅要负责大队一级公共产权的维护、管理和使用权利的分配,而且要保证各生产队之间权益和义务的均衡。这样,无论是征、派购计划的制定,还是口粮分配的标准与方式的确定,都是在组织行政化背景下在公社、大队及生产队之间的讨价还价之中完成的。

基于上述,可以认为生产队所拥有的产权严重残缺,而且与大队、公社之间所达成的合约也是强制性的,政府不仅拥有对生产队的合约控制权利(如关于要素配置的限制),还拥有相应的合约享益权利(如征、派购任务)[5];生产队的剩余分配权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谈判"中以"鞭打快牛"的方式反复受到侵犯;大队负责人作为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因强大的行政压力与意识形态导向,其个人效用函数明显偏向于完成受命于政府指派的任务,其政治寻租往往使生产队在谈判中受损(生产队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类似的倾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人民公社组织制度的失败归结为以下原因:一是存在于生产队生产中高昂的监督与计量成本,以致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下节将给出专门的解释)。二是产权弱化导致排他性极差,从而失去对生产性努力的激励。三是代理人寻租造成的对社区福利的损害,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分配性努力的示范效应。四是人民公社不仅具有高级社时期的一次性博弈特征,而且因对人力资源所有权的控制,农民失去了选择经济组织的自由,因而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组织参与具有比高级社更为严厉的"锁定"性质。尤其是人民公社组织与农村社区是重叠的,从而使这种"锁定"性极大化,这就意味着初级社存在的退出威胁效应,在人民公社已完全消失。五是人民公社组织与社区重叠造成的组织垄断,在政府强大政治力量的保护下,几乎失去了外部组织的竞争压力,从而促其改善组织效率的动力丧失殆尽。六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太大,从而带来集体行动的困境[6]。七是可能与人们的预期有关。由于这一观点尚未被文献提及,故单独做些说明:

一个广为人们承认的事实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组织下的劳动时间与收入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关联性,或者说在大规模组织的生产中,一个人所挣得的工分数与其付出的劳动时间有直接关系,但与其努力程度(劳动质量)关联则很小。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农民从高级社就开始了对这一知识的学习),一个农民会预期:一方面,一个人的工分数不仅与自己的努力程度无关,也与他人的努力程度无关,即使他的工分值取决于由4000—5000个家庭组成的生产单位有关,且即便一个人的努力完全是非生产性的,他的工分值也只下降0.02—0.025%,按每个劳动工日0.47元,他的损失也不足十分之一厘钱,由此他不会对别人的偷懒进行监督(因为监督成本是私人承担,而由监督带来的收益具有公共性);同样的道理,他的策略也尽可能是"偷懒"而"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农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还保留有 5%左右不等的土地作为自留地, 他会将自己的生产性努力实施于自留地。

因此, 在公社体制下, 农民的预期不仅使其做出生产性努力的动力不足, 也使相互间监督的动力不足。

或许关于人民公社失败的根源的讨论仍会继续,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政府强制性的不当制度安排应是最基本的根源。

三、败德行为与"柠檬市场": 人民公社失败的进一步解释

尽管学术界对人民公社失败根源的理解仁智相见, 但对人民公社体制组织所隐含的高昂监督成本及由此导致的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确有共识。对此我们尝试使用"柠檬市场"模型给予重新解释。

当一个成员为其组织集团工作, 而工作的成果同时取决于投入的努力和不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各种客观因素, 且两种因素对组织集团来说又无法对此完全区分时, 就会产生参与成员的败德行为(moral hazard), 如偷懒、磨洋工、偷工减料等, 这在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事实上, 组织成员对自己的付出努力的程度是非常清楚的, 他拥有信息优势, 而组织集团对此无从得知, 或者说要了解这些信息所需付出的成本(监督或计量成本)变得惊人以至于极不经济。由此, 败德行为有时被称为"隐藏的行为"(hidden action); 又因这种行为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组织无法确知其真实信息, 故又被称为"隐藏的信息"(hidden information)问题。而隐蔽的信息会导致不利选择或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如在农业组织中, 由于组织者无法察知每个成员的劳动努力, 因而只能按一个大体的平均工资支付报酬, 而一部分参与者的努力程度若超过平均劳动努力程度, 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劳动中必然会减少劳动, 而这势必会导致总产量下降, 于是组织者将下调工资水平, 相应地参与者也将再次减少劳动努力, 如此的结果, 是所有人都将不会提供高劳动质量, 而选择"出工不出力", 最后的结局是"大呼隆"、"吃大锅饭"。这一结局就是著名的"柠檬"市场(the "lemons" market)。

下面我们从农民从事集体劳动的努力程度的度量问题出发, 来说明人民公社组织中的"柠檬市场"问题。

我们将公社组织抽象为一个雇主(他可以是大队或生产队中的队长); 组织成员即参与集体劳动的社员农民被视为雇员。我们还将这一组织视为一个劳动力市场, 雇员出售自己的劳动(视为商品), 雇主购买劳动支付报酬。并且, 我们仅仅考虑市场惯例, 而不考虑组织中的强制约束。

纳尔逊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献中, 首次区分了搜寻型商品和经验性商品。[⑥] 按纳尔逊的定义, 人们在选购之前可通过检验而获得商品的质量, 这叫搜寻型商品, 而纯粹经验型商品只有通过人们使用后才可度量出其品质。与之对应, 如果我们将公社组织中社员付出的劳动看作商品, 那么这一劳动商品也可做同样的区分。雇员的劳动努力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从事集体劳动的时间(劳动数量), 二是从事劳动的用心程度或出力程度(劳动质量), 于是雇员提供的劳动商品中, 前者(劳动数量)可称为搜寻型商品, 后者(劳动质量)可称为经验性商品。现实中, 作为集体组织的抽象人即雇主可以通过搜寻或经验而度量出绝大多数雇员所出卖的劳动的品质属性, 但了解品质的较好方法取决于不同度量手段的比较成本。[⑦]

经验型品质的概念揭示, 如果雇员不能从向其声誉投资行为中得到好处, 他就缺乏足够的动

⑥ P. Nelson: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2): 331－359.

⑦ 参见 T. 埃格特森著:《新制度经济学》, 商务印出馆 1996 年版, 第 175 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力向组织集团提供高质量的经验型商品。正如“柠檬市场”所表明的，此种情形下低劣的劳动商品会把高质量的劳动商品驱逐出公社组织内的劳动市场。

我们假设农民向公社组织提供的劳动商品x的品质有一个范围：最低品质q_{min}和最高品质q_{high}。提供高质量劳动商品的成本较高，从图1中相对的边际成本线和平均成本线的位置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忽略掉度量成本，很容易找到高质量x和低质量x的均衡价格（单位劳动报酬）和产出（劳动提供量或努力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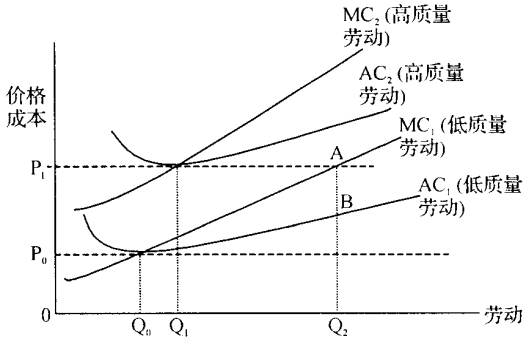


图1 经验型商品：农业组织中的柠檬市场

在一个公社组织中，一个提供低质量劳动商品x的农民，其长期均衡的劳动供给量定在提供平均单位劳动成本最小的地方，即图1中的Q_0水平。x的相应均衡工资报酬（劳动价格）是P_0。相似地，提供高质量劳动商品x的农民，其均衡劳动供给量是Q_1，面临的外生市场价格（单位劳动工资报酬）是P_1。

一旦引入度量品质的成本，上述均衡结果就不复存在了。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公社组织者在给每个组织成员支付报酬，要费很多成本去弄清每个农民提供的劳动的质量状况，而这些劳动的品质属性又必须是通过仔细观察后才能获得。又假设每个参与者可以不计成本来控制自己所提供劳动的质量，这表明，在人民公社组织中代表雇主的组织与代表雇员的社员之间的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这必然会引起道德风险。除非雇主能够有效地分辨低质量劳动与高质量劳动，从而支付不同的劳动工资（P_0与P_1），⑧否则逆向选择必然会导致这一劳动市场走向柠檬市场。

一个假冒高质量劳动的雇员，他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劳动投入量是Q_2（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集体劳动中磨洋工的农民往往乐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出工而不出力），而且他以P_1的单位劳动工资率来获得纯收益$Q_2\times(A-B)$，这里A－B是在Q_2水平上工资率与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之差。但是以次充好只能在短期内行得通，雇主通过体验发现“自己”受骗了，于是，在对各个雇员的劳动质量无法分辨的情况下（或分辨的成本极高），雇主会拒绝向任何劳动商品x支付P_1的工资率，当$P<P_1$时，高质量的劳动自然就会在组织中的那个“劳动市场”上消失。雇主通过不断的体验不断地发现受骗，于是不断地下调工资率P，较高质量的劳动不断地消失，以至MC_2与AC_2两条曲线不断下移，最终与MC_1、AC_1重叠，此时，组织中每个成员提供的劳动商品的质量都是q_{min}，于是人民公社的“柠檬市场”出现并以效率低下而告终。

四、结论与讨论

1、不同的制度安排，隐含着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诱导着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经济组织的不同绩效。制度安排所包含的激励功能、约束功能、收益与预期保障功能，具有重要的行为发生学意义。

2、制度绩效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对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行为预期。而制度安排不仅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约束，而且也会受到产业特性、资产特性的约束。在相同的经营环境条件，不同的制度安排隐含着不同的预期，意味着不同的考核成本。理解经济组织成败得失的关键仍是交易费用，其中的监督与计量费用以及契约的维护费用尤为重要。一个

⑧ 这将意味着高昂的监督与计量成本。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既取决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组织制度安排与环境的相容性。

3、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败德行为以及不确定性的情形下,如果所内含的计量能力差,且缺乏适宜的风险分担机制、剩余索取权安排、自愿的契约博弈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从而不能帮助人们形成他们经济行为的稳定预期,不能有效地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或排他性软弱,也就不能激励和保障人们通过生产性努力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由此,不仅组织效率与经济绩效受到损伤,而且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4、在集权政治秩序下,那些与官僚集团或核心领导者的偏好相一致的制度安排能够得到持续的维护,而与之不一致的制度变迁则极难推进——如包产到户在长达 20 多年的人民公社时期中的五次冲动又五次被压制[7]。集权政治结构使得核心领导层在制度安排的博弈中具有明显的力量对比优势,从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发生、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及时间路径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决策层的偏好。

5、一种组织制度的低效率或失败,可能源于多种原因,但产权结构的功能残缺、组织资源垄断与一次性谈判博弈基础上的"锁定"、高昂的监督费用与计量成本、分配性努力造成的偷懒与"搭便车"、制度环境所约束的组织形式选择空间,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对人民公社体制组织来说,政治力量构成的制度环境约束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及其所隐含的逆向激励结构,应是最基本的根源。

参考文献:

[1] R.科斯.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3.
[2] A. A. Alchian,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12): 77—95.
[3] 罗必良. 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变迁: 线索、趋势与目标模式[J]. 经济学家, 1996, (5).
[4] 罗必良, 曹正汉. 政府行为与产权制度[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9, 夏季号.
[5] 陈剑波. 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J]. 经济研究, 1994, (7).
[6] M.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7] 綦好东. 新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历史变迁[J]. 经济学家, 1998, (1).

The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to the Failure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LUO Bi-l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ory model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measurement capability-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economic performance",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failure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y introducing the "lemons-markets" mode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nitor cost, the article indicates "moral hazard" is the failure mechanisms.

Key Words: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monitor cost

【责任编辑:陈　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